

# “新人”归旧学

## ——民国留美学生张彭春的国学书目和作文训练

张诗洋

**内容摘要** 新发现的张彭春日记详细记载了20世纪20年代张彭春留美归国后的国学阅读史。这不仅是个人的读书、写作历程的真实记录，亦反映了一批寝馈于西洋文化的留学生，在趋新与守旧思潮并存时期的精神蜕变。张彭春中文表达水平低于英文，他甚至因此产生认同危机，也意识到仅依傍西方思想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受好友胡适“整理国故”的影响，张氏从张之洞、胡适、梁启超开列的三种书目入手，并在梁启超、徐志摩的具体指导下，有计划地阅读国学典籍，进行作文训练。从西学中“转身”到对中学“追赶”，张彭春的阅读、写作，和他所提出的“平民文学”“活话”等理念，对于“创造本国本时代所需要的制度、精神和方法”的追求，具有一定代表意义。

**关键词** 张彭春；阅读史；国学书目；白话文；旧学

在清末民初以降的学术史语境中，赴欧美或日俄留学的学生，接受了西方科学与文明的进步思想，提倡“新学”（亦称“西学”）。这些留学海外的青年一代，积极发扬西方传入的思想文化，被视作“新人”。与之相对的，带有传统保守意味的“旧人”，往往经历科举，或在学问根柢上主张发扬固有的未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旧学”。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打孔家店”、挾伐“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呼声中，“新学”获得了绝对的支配地位。“五四”之后，思想风潮有变，文化传统应如何继承一直是争论最集中的问题之一。“旧学”的意涵得以保留，时或被称为“国学”或“国故学”。

张彭春正是这一时期的留美“新人”，胡适曾评价其为“今日留学界不可多得之人才也”<sup>[1]</sup>。然而，在经过了8年的美国留学之后，张彭春回到新学几乎压倒旧学的中国，反而转身回归自己完全不擅长的国学领域，有计划、有步骤地阅读古代典籍，并尝试用中文写作。与此同时，他支持白话文运动甚力，主张使用“平民的语言”，开展新剧创作与排演活动。凡此种种，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五四”以后知识分子视域下的中西、

新旧并非截然对立，仅依傍西方思想并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sup>[2]</sup>。

张彭春在当下的研究中或许不算知名，但在民国时期影响力不小。他与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陶行知、梅贻琦、梅兰芳、洪深等人均有密切交往。为更好地梳理张彭春的国学阅读史，这里先简述其生平<sup>[3]</sup>。张彭春（1892—1957），字仲述，天津人，教育家、戏剧家和外交家。他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先行者”<sup>[4]</sup>，与洪深合称“南洪北张”，是教育家张伯苓的胞弟。1904年，他进入天津私立敬业中学堂（南开中学前身）学习，后考入保定高等学堂。1910年，考取北京游美预备学务处（清华学校前身），同年与胡适、赵元任等作为第二届庚款游美生赴美学习。张彭春先后在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就读，1915年获文学及教育学硕士学位。1922年，以题为《从教育入手使中国现代化》的论文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学校教授兼教务长，力主改革旧制，成立清华大学部，并倡议创办国学研究院<sup>[5]</sup>。1926年6月，辞去清华职务，回到南开大学。后曾两度陪同梅兰芳赴美、赴苏演出，担任艺术总指

导。1938年后，张彭春工作重心转向国民外交活动。1948年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

张彭春在话剧方面颇有建树。他曾创作剧本《外侮》《新村正》《木兰》（与洪深合作）等，其中多部作品曾在美国搬上舞台。他将西方导演制度引入中国，建立正规的话剧编导制，被誉为“北方现代话剧的奠基人”<sup>[6]</sup>。其开展的一系列新剧编演活动，包括指导南开新剧团排演的《一念差》《娜拉》《国民公敌》《少奶奶的扇子》等，成为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重要源头，亦是教育与启蒙的利器。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今人对张彭春的了解并不算多。笔者日前发现并重新整理的南京图书馆所藏42册未具名文献“清华大学某教师日记”，实即张彭春日记<sup>[7]</sup>，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能。张彭春及友人经历的文学论争、思想变革，均在日记中留下记录，是研究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的一手材料。其中，张彭春这一“新人”回归“旧学”的阅读选择背后，其价值取向的转变和思想理路的幽微之处，也在日记中有所体现。

阅读行为尽管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终究反映了集体意识和时代底色。与张彭春同时期回国的留学生们，所面临的更多是“新”与“更新”的选择。而本科、硕士、博士阶段全程接受了西洋教育的张彭春，回到尊西崇新的国内，反而躬身苦读中国书，可谓饶有意味。想要全面探讨新旧交替中的思想走向和知识话语体系，显非一篇文章所能为之。因此，本文仅对张彭春日记中详细记载的国学阅读实践与写作话语探索作一考察分析。

## 一 读书与表达焦虑下的认同危机

张彭春与英国留学归来的徐志摩志趣相投，曾共同组织红极一时的文艺社团“新月社”。张彭春因为徐鼓励其写文章，在日记中吐露自己中文写作存在很大问题：

昨天志摩北上过津。我到北洋饭店去看他。他要我写文章。

……读过书太少所以字句不够用。希望太奢，每作一两句东西，就想不朽，也真可笑！

于是越不写，越写不好，越怕写！近两年来，日记还敢写，也是因为不给人看。（1926年3月12日）<sup>[8]</sup>

除了不给外人看的日记可以无所顾忌、写得畅快之外，自己“最可耻的是文字的工具”（1925年5月6日），陷入了“越不写，越写不好，越怕写”的怪圈。张彭春两年前就向徐志摩坦陈，自己对于文字“是一个哑子”（1923年7月26日）。

张彭春遭遇的文字表达困局，在当时的留学生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朱自清曾评价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的诗：“不知是创造新语言的心太切，还是母舌太生疏，句法过分欧化，教人像读着翻译；又夹杂着些文言里的叹词语助词，更加不像——虽然也可说是自由诗体制。”<sup>[9]</sup>这一评价，颇能反映时人阅读李金发欧化语言的不适感，也暗含对其留学导致母语生疏的批评。不过，李金发是诗人，文白夹杂、前后断裂或许反而可以成为语言艺术特色。而作为教育者和剧作者的张彭春似乎没有这么走运，母语能力与外语能力之间的失衡，常常将他置于窘境。与朋友徐志摩、胡适等人相比，张彭春自言“没有过文学的出品”（1924年4月4日），发表的文章有限，因此他曾怀疑新月社同仁轻视自己。直到1932年赴美国教书之前，他仍提醒自己：“写文字，一概行政小事不必问。Marx、Lenin、Gandhi用文字，Ibsen、Hartmann、Shaw用文字，Dewey、Shatsky用文字，胡适、梁漱溟用文字，田汉、西林也用文字。知识分子的作品自然用文字造成。征服文字——这就是这一阶段内在矛盾的质变。”（1932年10月26日）日记中，张彭春见贤思齐的三类西方人物分别为政治家、戏剧家、教育家，与其专长各有重叠，颇能显出张彭春此时的胸襟抱负。而与同辈友人客观存在的差距，也促使张氏迫切希望熟练运用文字工具。

作为第二届庚款留洋的学生，张彭春本科、硕士、博士皆在美国学习，深受“洋墨水”濡染。他写了多部英文剧本，并在美国舞台上公演，英文表达与写作一直是张彭春颇为自得的看家本领。但中文表达的欠缺、文词上的干枯乏味要如何弥补，他还不得要领。在与徐志摩数次交谈后，张彭春解除了一些困惑，知道根源在于“一是读的书少，二是

天赋的缺欠”(1923年11月13日)。既然天赋无从改变,那么读书便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然而书籍浩如烟海,从哪里读起呢?读中国书还是外国书呢?张彭春藏书有限,并且“多半是美国书”(1924年11月10日),因此这一时期的阅读先从其熟悉的西洋文学开始。不过张彭春发觉,“近代西洋文才是气浮,不能忍,不能静”(1923年7月27日),西洋文学易使青年人“坐在那里做梦”(1923年8月2日),因此他放弃了以西方文学(或中文翻译本)作为主要阅读对象。更重要的是,西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张彭春在心中打了一个问号。

“五四”前后,正值中国社会思潮风起云涌的变动时期。随着西方事物和观念的大量引入,社会寻找新制度与新思想的需求产生,中外、新旧之争一时成为学术热潮,新文化运动“打孔家店”、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潮有所回落。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学衡派主张“阐扬旧学、灌输新知”,同台登场。正在寻找读书方向的张彭春,被裹挟在这场论争当中,学问兴趣正发生转移。他认定,“到中国,就要加强国学之根底”,“最低限度的普通国学知识是必须有的”(1924年7月11日)。

张彭春对于胡适全面接受杜威的做法有所怀疑。胡适称,杜威实验主义哲学教会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实验主义”成为他“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和“哲学基础”<sup>[10]</sup>。来自西方的理论,正引导胡适开展中国文学革命,倡导白话诗文,考证历史和小说。这引发张彭春对于中西、新旧等问题的思考,他不无针对性地写道:

问一问根本的问题,绝不是将一切组织制度一时全推翻。不过我们应当知道一个“为什么”,然后作的时候信心可以坚固些,兴味可以长久些。在新旧交互的时候正是研究问题最好的机会。

第一步,当在比较研究之前,必须知道新的是什么、旧的是什么。半新不旧的,半旧不新的,都是什么!第二步是分析当时此地环境的变迁。第三步是定新标准,从以往经验得来,不拘人,不拘地。第四步是计划实施的草案。第五步是审定实验出来的结果是否合于环

境的变迁趋势。(1923年1月31日)

张彭春也是杜威的学生,但他客观地认识到中国的教育“只依傍杜威是不成功的”(1923年1月21日)。张彭春看到时下的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对于新思潮与新方法的态度常常非左即右,动辄“拿外国学说来作根据”(1923年1月21日),而不能全面准确了解中国的过去与当下,以求对症下药。对张彭春而言,“新的”已了解,而“旧的是什么”——历史、文化、心理的传统——均需要从阅读中汲取,如此才能有的放矢,改造当下。

张彭春崇敬的学人中,如梁启超、林长民,皆有扎实的旧学功底。在读到林长民于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1913年)上发表的宣言时,张彭春惊叹“文词精练”,并由此想到,“现在作白话有成绩的人亦都是文言文很有根底的,所以文言的工夫一时是舍不开的”(1923年8月5日)。同时,在与徐志摩、胡适、陈西滢<sup>[11]</sup>以及话剧界的洪深、欧阳予倩、丁西林等人的交往中,张彭春也逐渐觉出想要对社会发声,则需要“以文字为不可少的工具”(1923年8月5日)。而自己不擅文字表达,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学功底的浅薄。要训练文字表达的“器”,则必须要“好好读起古书来”(1923年8月5日)。

张彭春向同门胡适请教“旧文学”之密钥,以进入读中国书的语境。当时,胡适保持着“每年平均写二十五万字”(1924年1月6日)的速度。张彭春曾多次表达对胡适“文学生活”的艳羡,“请适之指导,读中国书”(1924年4月4日)的愿望,在新月社多次聚会活动中得以实现。张彭春细读胡适所编《词选》后,请教如何创作诗词。胡适的回答不出清人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范畴,建议他先熟读、背诵二三百篇词中佳作,自然而然就会创作了。而张彭春将其奉为圭臬,领悟到包括诗词在内的一切旧学功底,“是非背诵不可的”。张彭春做好了拥抱古典的姿态,他认为,“书多如烟海,必须善择善弃,而后庶几可收微效。然而有些普通书是一个有高等教育的人必须读过的。现在无须踌躇,任择一种就可起首”(1924年2月24日)。此前,张彭春还与友人谈及《四部备要》,打听中华书局的售价(1923年8月

5日)。若为藏书之用或是为学校购置则无可厚非，而张氏若以此大部头作为入门读物，则不啻于蛇吞象，更切实的读书计划恐怕还需再斟酌。

## 二 阅读中的三份国学书目

张彭春把自己1923年至1932年间的读书生活称作“素位而行”，为国学打基础。他亦步亦趋地学习胡适如何读书写作，稍作尝试，便看到了二人之间的差距：

由天津图书馆借来崔（东壁）述《洙泗考信录》。崔是胡适之很佩服的，听说他正为他作年谱。我自己立还不能，就要同世界大运动家学赛跑，真是妄想！一定有时给识者作笑柄。（1923年3月29日）

张彭春评价胡适，“整理古书的条则，适之可以算得汉学的真传。头脑真是灵活，读书也很博详。这样整理古书的学问，绝不是半路出家的人所可望及的”（1923年8月12日）。他自嘲在学问上“立还不能”，便要 and 胡适“赛跑”。此后，张彭春意识到需要为自己订立更切实的读书计划：“现在起首读《论》《孟》，将来接续读《史记》《纲览》等，为是研究民族已有的经验和感想，不能知道以往的，绝不能谈将来。”（1923年10月2日）从中可以看出他学术上的青云之志，也可知其回国后读古书、补旧学的急迫。

关注阅读史，有助于了解被研究者知识谱系的构建和精神生活的变迁。张彭春在1923年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读过的书籍刊物，在其个人阅读史中具有典型性。为研究张彭春思想变化的缘由，容一一列举如下（均以阅读起始月份计）：

1月：《清代学术概论》

2月：《日知录》《广艺舟双楫》《民治与教育》

3月：《墨经》《孟子字义疏证》《洙泗考信录》《文史通义》《读书杂志》《论语正义》《经传释词》《经义奇闻》《清代学术概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章实斋年谱》《国故论衡·原学》《先秦政治思想史》《清华周刊》《努力周报》、杜威（按，未详书名）

4月：《论语》

7月：《论语正义》

8月：《大学》《礼记》《中庸》《孟子》《论语传注》《仁学》《小说月报》

9月：《史记》《文献通考》《书目答问》《轱辘语》《明儒学案》

10月：《清朝全史》《领袖人格》

12月：罗曼·罗兰、墨利（按，未详书名）

由上表可知，张彭春当时的日常阅读书籍，大体分为古书、新书与西洋书三类。其中古书最多，也读得最为精细。如《论语》《大学》等，张彭春按照“日课”的要求，每日做句读，常在日记中抄录。而《清朝全史》《文献通考》等多种大部头的书，是备课时仅作浏览之用的。张氏所读时人新书多以研究古代为主，西洋书则主要作为参考读物。

我们以梁启超所读书目为例，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张彭春31岁精读的四书五经，是梁启超5岁前的童蒙书；《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等，在梁10岁左右已经读完<sup>[12]</sup>。再以胡适自述为凭据，胡适13岁去上海求学前，亦曾读过四书五经、《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孝经》《律诗六钞》《原学》等<sup>[13]</sup>。张彭春自小并无扎实的国学基础，13岁入私立敬业中学堂，学习国文、英文、算学、理化、史地等多种课程，分配到国文一科的时间很有限，其旧学功底可想而知。

张彭春从阅读国学书目中，找到了进入旧学的门径。与张彭春有交往的胡适、梁启超也先后编过国学书目，且这两份书目均与张彭春所在的清华学校有关。

1923年，几位清华学生出洋留学之前，请胡适开列一份可以“得着国故学的常识”的书目以供学习，胡适欣然应允。早在1914年发表的《非留学篇》中，胡适已痛陈“今日之大错，在于以国内教育仅为留学之预备。是以国中有名诸校，都重西文，用西文教授科学”。作为留美学生的一员，胡适深知留学生国学底子薄弱的情况。而不能著书立说，就无法对现实中国产生影响。因此，胡适建议将国学、文学、史学作为必修课和留学前的必考科目，希望留学生了解古代中国文明，“兴起其爱国之心”，塑造日后“介绍文明之利器”<sup>[14]</sup>。

胡适开具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分

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和文学史之部三个部分，共涉及 184 种书籍。不过，这份书单受到了《清华周刊》记者来信的质疑：一是涉及的国学范围不够广，如民族史、经济史等并未包含；二是思想史、文学史部分又显得太深，不合于“最低限度”的标准<sup>[15]</sup>。

张彭春仔细看过胡适的“书目”，发觉从这个书目里看不出什么求国学的法门，然而可以看出“胡先生所谓国学的是从这书中可以得来的”（1923 年 3 月 10 日）。按照张彭春的划分，胡适书目当中针对思想史和文学史开出的书籍，当是治国学的研究者读的，也是大学思想史和文学史所必备的读物。所以按胡适的次序，把这些书从头到尾读一遍，是国学研究的应有之义<sup>[16]</sup>。不过，不作专门研究的普通人，应当如何获得一点国学的知识和古典教育？显然，张彭春认为胡适的书目还未能回应这一问题。

梁启超也表示对胡适书目并不满意，认为其将“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这份书单成了私人及公共机关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sup>[17]</sup>。于是，梁氏另立《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发表在 1923 年 4 月的《清华周刊》上。梁氏书目范围更广泛，涉及五大类：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小学书类及文法书类、韵文书类及随意涉览书类，共 133 种。梁启超提醒青年新文化建设不能只读西洋书，鄙弃中国古书。针对当时反对读古书的风气，他说：“读书自然不限于读中国书，但中国人对于中国书，最少也该和外国书作平等待遇。”<sup>[18]</sup>同时，考虑到“最低限度”的问题，梁氏书目后还附录了《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包括“四书”等 25 种书<sup>[19]</sup>。

显然，梁启超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对张彭春更便于实践。张彭春在日记中大段摘录了梁启超回答《清华周刊》记者的谈话：

国学常识，依我所见就是简简单单的两样东西：一、中国历史之大概；二、中国人的人生观。知道中国历史之大概，才知道中国社会组织的来历。中国人的人生观就指过去的人生观而言；人生观是社会结合的根本力，所以知道过去的人生观是常识的主要部分。

你们应当读的书：（一）论语（二）孟子（三）左传（四）礼记（五）荀子（六）韩非子（七）墨子（八）庄子（九）老子（十）易（十一）史记（十二）通鉴。这是你们应当读的最低限度了。你们读完这些，大概可以有个中国史的大略，可以略略明白中国人的人生观了。（1923 年 3 月 15 日）

张彭春十分认可梁启超精简后的纲目，并多次向梁启超请教。当时，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要》课程，张彭春旁听后，盛赞梁授课“材料真丰富”，“这才算是学者”（1923 年 7 月 24 日）。张氏认为梁启超所述清儒颜元的学说，强调习行，反对读书穷理空谈心性，与自己最有相契之处，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他把自己读书中对于颜元的所得悉数告知胡适，胡适很赞成他读书以“颜李”作中心。后来，胡适还劝张彭春，“常读文学，先从几大家泛读入手，渐渐也可在文学上寻得中心”（1924 年 9 月 9 日）。张彭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国学储备后，计划从颜李之学开展系统阅读，把在清华工作的第二年定为“颜李年”，第三年则继续研究颜李，以期与“旧文化发生关系”（1924 年 7 月 2 日）。梁启超则认为，颜元所树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sup>[20]</sup>，这其实也是张彭春此段时间立足现代修习国学的精神写照。

1923 年 9 月，张彭春读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该书是作者因诸生不知“应读何书”及“书以何本为善”<sup>[21]</sup>，而为他们开列的导读目录，以指示经史、考据、词章诸学门径。张彭春看过《书目答问》后，认定其中提到的“几千卷是应当读的”。他还在当日抄录了一段附于《书目答问》后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张彭春认为这是“为学的正业”，“识见比平常高明得多”（1923 年 9 月 5 日）。此时张彭春入职清华不久，庶务繁多，读书时间有限，往往只能放在一早一晚。《书目答问》一定程度上坚定了张彭春心中所想。他希望以书目为线索进入国学领域，用十年不计成本地阅读，以达到“经

学史学兼词章经济”的水平（1923年9月5日），实现“读古书，写文章，养精神”（1923年9月10日）。

张之洞、胡适和梁启超的三份书目，均在当时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张彭春的记述中，国学书目指示读书门径的功效也显而易见。从书目指导到具体古籍阅读，张彭春受到了好友胡适影响，并得到梁启超亲炙。个人阅读史即是精神成长史，张氏在阅读中逐渐完成了趋时而不忘古的精神蜕变。

### 三 新文艺、旧文化与活语言

经过三年的读书实践，张彭春已有明确的阅读目标。他在日记中总结关于读书的思考，包括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怎么读书。

#### 一、为什么？

国文不应用，这是工具问题，多识字，多积理，多作多写。本国以往经验知道的太少。想明白现代的变迁，必须注意此民族以往的经过实际和理想。特别是对于生活意义有兴趣的人，必免不了这步工夫。终身事业既是教育，本国人生观，民族心理及历史人物的背景陶冶修养等方面自然是必须研究的。从外国学教育回来的讲些什么心理、哲学、教育史、教育制度、测验、教学法等，而所用材料，外国工商业发展后的情形居十之八九。我们必须创造本国本时代所需要的制度、精神和方法。在外国材料上我已用过十多年工夫，本国材料早应当注意，然而一则因为根柢太浅，二则因为公事太忙，所以总没有专心去作。

#### 二、什么书？

作民族心理背景的书——如“四书”、《水浒传》《三国演义》。

普通哲理书——如庄、荀，及先政修养法等在内。

史书——如《史记》《通鉴》，年谱等。

文艺书——如诗、词、戏曲、小说。<sup>[22]</sup>  
(1926年2月23日)

应读的书中，涵盖了经部（四书）、史部（史书）、子部（哲理书）、集部（文艺书）。张彭春尤

其希望了解“民族以往的经过”，研究本国人生观、民族心理及历史人物的背景陶冶修养等方面的内容，“想明白现代的变迁”，以此用于教育和文艺。

除以上所列“读什么书”的计划，张彭春的阅读还包括时兴的报刊杂志：有“现在最流行的杂志”（1924年2月19日）《北新》《语丝》《创造》《现代评论》，还有《小说月报》、上海的《时报》、学校刊物《清华周刊》和《南大周刊》等。他虽然告诫自己读书功夫不能全用在文艺方面，“教育是我的本职”，但同时也向好友徐志摩借阅“新文艺”的书：

我要知道现代一般青年所想的，所读的。借着这几个新文人很可以晓得许多一时的思潮。……教育亦是思想的一种，是很要的一部分。（1923年11月12日）

从事教育必须要“同现代思想界有相当的联络”（1923年11月12日）。与新文人交往，可以把握一时代的思潮，此言不虚。张彭春参与新月社活动，结识了多位文坛弄潮儿，但他意识到为艺术而艺术的新思潮，多是文人抒发一己私情的产物。不与时代与生活相连，新文艺乃是无本之木，不会结出丰硕果实：

新文艺只为几个文人抒情，是没有大将来的，必须跟全国人民的生活连上，然后才可以有结大果的机会。（1923年11月13日）

“五四”前后，小报竞起，对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文艺有“抒情”太过的问题，是随意作文思潮的反映，但与张彭春崇尚的文风不相符。张彭春更偏向于取法古典，“如果私淑孔先生于练习写文章上，胆子又要小一些”（1923年11月15日）。显然，张彭春所针对的，正是胡适所谓有勇气就能作文的主张<sup>[23]</sup>。因此在训练自己的文笔时，张彭春有意选择私淑“孔先生”，以国粹和旧文学为宗。

读书与写作是张彭春回归国学的一体两面。在锤炼“文字工具”的过程中，张彭春也形成了对“活语言”与“新文艺”的独到见识。张彭春的国学阅读和作文训练是行之有效的。1924年4月，张彭春结合颜元相关的阅读经验，为北京历史学会做了题为《颜元的所谓“学”》的演讲。之所以对

演讲提早“小心预备”，也是按照胡适的作法，即利用每次讲演，练习写作一篇研究的文章，在文字上亦可多一些发表的机会。演讲的讲稿与一般写作又有不同，职是之故，张彭春逐渐摸索出文言与白话不同的话语体系。

此前，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倡文学革命，反对贵族的、古雅的文言文，倡导平民大众的通俗白话文学。“在过去知识原是士大夫阶级的专利品，推行白话的目的就是普及知识。白话运动推行的结果，全国各地产生了无数的青年作家。”<sup>[24]</sup>作为载体和工具的白话易懂易学，接近中国的口语，也顺势成为革命的火枪。

文言、白话之争沸沸扬扬，“一时不能分胜负”（1925年7月23日）。张彭春将二者的差异，理解为“看”与“听”两种表达方式的不同用途：“两个最大分别，一个是写出给人看，一个是说出给人听。”（1925年7月23日）白话是说与人听的，自然要人一听就懂，而习惯了雅驯的书面表达者，看到白话或感到不够古洁。白话的盛行，并不意味着文言的全面溃败。他继而分析，《学衡》《甲寅》等刊登了一些“不满意的白话文”（1925年7月23日），不仅白话的“活气脉”没得着，而文言的简练也被丢开了。在这一点上，张彭春与周作人态度颇一致。周作人认为白话文与古文两者本质上没有什么优劣可言，有区别的“只是时代与实用的问题”<sup>[25]</sup>。张彭春认为，写信、作文等书面表达，白话、文言两者皆可；戏剧及演讲，“用白话是没有问题的”，而“寻常说理文字都可用演说或谈话式，情景文字还是白话好”（1925年7月23日）。文言是现代语的来源，因此无论是对于专门的研究还是日常的应用，古书都很有参考的必要。白话文普及之后，仍需多读古书，勤加写作。

张彭春意识到，“五四”之后提倡的白话实际偏向于文人的、古书里的白话，而不是日常生活的“活话”。他寻绎的“活的语言”，应从生活经验中直接得来，且需满足两个条件：（一）必须是本国现代人用的，（二）必须与本国以往的语言有延续的血脉。（1923年12月17日）这种“活的语言”须产生于平民生活中。在考察国内教育情况之后，张彭春感叹“现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

几个教育中心都是假的，因为他们讲些与中国实情没关系的空学问”（1924年10月5日）。文化界盛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在张彭春看来也不够切实：“不是知真中国的途径。要知真的、活的中国，必须生活人民现时的生活。”（1924年10月5日）不论语言还是学术，端赖真切的生活才能有源头活水。白话取代文言已成定然之势，如何能长久发展，是值得深思的话题。张彭春提出，“活气脉”是白话文能不能长久的关键。活气脉从哪里寻得？是从人与人接近，“有情感事理，想发表给人听”的活经验得来（1925年7月23日）。他还在清华教育改革中，提倡“大学生活，应有一部分是经历人民的生活，使学生得生活多数人的生活”（1924年10月5日），提倡将书斋中的学生、作家引向广阔的平民生活天地。张彭春提出：“如何可以运用民间的活话？得着这个妙诀，中国真的新文学就要出现了！”（1923年12月16日）这一见解，在当时胡适提倡白话文学的余波之下，不可谓不先进。

“五四”之后，新文学作家关于“平民文学”的概念言人人殊。周作人认为平民文学是指普遍、真挚的具有平民精神的文学，胡适认为是民间的、田野的、非贵族的文学，而鲁迅则是指工农解放后真正体现工农思想的文学。不过，张彭春在阅读及交往中，认识到作家本身皆有自身的局限性，他们的文字富有学理性，但缺少张氏所提倡的平民的“真”。张彭春阅读辛格和罗曼·罗兰的作品时，看出作者对于平民语言真正的欣赏和利用。产生这种平民语言的根柢，来自生活中产生的深广的个人经验：

文字的工具自然重要，然而文学出品的根柢还在个人经验的深切，广博。这是天生给的生活力。（1923年12月16日）

平民的字句、活话的习得，包含了作家对于不具有文化权威、远离了政治权力的真正民间文学的向往，更需要个体对日常生活的体验、领悟与捕捉。这亦与胡适所谓“作白话文要作的好，应该从活的语言下手”<sup>[26]</sup>的想法不谋而合。张彭春所期待的平民语言革命，以产生中国独特的文学为目的：

在中国的实在情形上用功夫，将来在中国

大家都舍去所谓某国留学，用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文字，世界的眼光，个人的经验，来做中国多数人要求知识阶级应做的事。这一步是我早就看到的。（1925年5月10日）

这需要知识分子以社会现实为基础，拥有通达的世界眼光。而这一点，正是张彭春掌握了一定的西方理论后，又重新回归国学的真正底气所在。

## 结 语

张彭春回国之初曾设想，凭借自己在戏剧和教育方面的优势，倘能弥补国学之不足，便可超越许多同辈学人。不过，张彭春任职清华不足一年，便经历了匿名信风波。一封署名“清华大学一分子”的匿名信称，清华需要像胡适那样“中西兼优”的教务长，请张彭春让贤，退居西洋教员之席。（1924年4月5日）张彭春清醒地认识到，即使在清华这样的留美预备学校中，想要立足，也必须提高国文水平，兼具中西学问，而后才能施展自己的教育大计。

新发现的张彭春日记，生动地展示了他作为留美归来的“新人”，是如何在介于平民之上、巨子鸿儒之下的文化空间内生存的。无论是亦步亦趋学胡适读书，还是文艺上亲近徐志摩，都透露着来自身边人的“影响的焦虑”。他在学问上佩服梁启超、胡适，在艺术上羡慕丁西林、洪深，在教育方面不及张伯苓、曹云祥。张彭春为自己的“不如人”感到遗憾自责，也不断地寻找出路。不难想象，受到欧美雨洗礼的“新人”张彭春，回到故土后看到了理想与现实中国间的差距，在趋新与守旧中所产生的不自洽、甚至是认同危机。他的日记正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考察样本。

胡适有言：“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sup>[27]</sup>。其实，新旧交替过程中，传统的中断与延续并存，呈现复杂的态势，并非绝对的新战胜旧。此前，维新思潮下的中国不是日本之“东风”压倒欧美之“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旧学一时无人问津，被认作是无用、落后之学。张彭春1922年年底从美国留学归来后，恰值变局再

次出现。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系统阐释了“整理国故”的主张，使文化界重新关注国学，一时响应者众多。这也促使张彭春认识到，“新中国是旧文化和新经验相融而生。（别）人的旧文化是我最羡慕的，也是我最缺少的”（1924年5月10日）。这位寝馈于西洋学术背景下、崇尚新文艺话剧的进步人士，却在回国后不得不重新找寻旧学根柢，这在20世纪20年代显得意味深长<sup>[28]</sup>。在向旧学的“转身”和“追赶”中，张彭春的国学书籍阅读史和步履维艰的写作史，以及“平民文学”“活话”等理念的提出，对于“创造本国本时代所需要的制度、精神和方法”的追求，今日看来仍有一定意义。

1933年，胡适在写给韦莲司的信中评价他们共同的好友：“张彭春现在在夏威夷大学教书。……他似乎在外国的学术圈比在中国要适意多了。”<sup>[29]</sup>张彭春苦下十年功夫，在“旧学”上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1] 胡适：《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28卷，曹伯言编，第38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 回国不久张彭春便发现，“中国现在谈教育学术，不说东就讲西，动一动就拿外国学说来作根据”。他作为杜威的学生，清楚认识到国内教育“只依傍杜威是不成功的”。见张彭春1923年1月31日日记。

[3] 参见《张彭春年谱》，《张彭春论教育与戏剧艺术》，崔国良、崔红编，第615—710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 田本相：《中国现代话剧的先行者》，《中国话剧先行者——张伯苓 张彭春》，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编，第8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 据张彭春1924年10月7日日记载：“改造清华的思想大半出于我。因为文字不便都让别人用为己有去了。所谓研究院专门科草案都是我拟的。现在用我意思的人，一点也不承认谁是产生他们的！人情如此，已是可气。再不用文字发表出来，那就要被气闷死！”

[6] 黄佐临：《张彭春教授——北方话剧运动的奠基人》，《艺术百家》1990年第2期。

[7] 罗志田在《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一书及

《日记中的民初思想、学术与政治——20世纪20年代一位学人的观察》(《东方文化》2003年第2期)等文中,已充分注意到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18册张彭春《日程草案》的文献价值。笔者在南京图书馆发现的42册未具名文献,与哈佛燕京所藏系同种散出,参见拙作《新发现张彭春日记的文献价值考述》,《文献》2021年第5期。

[8] 本文所引张彭春日记内容,1923年1月30日至1924年2月29日、1925年2月19日至12月31日日记出自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日程草案》,其余均出自南京图书馆所藏佚名文献,目前尚在整理中,拟放入“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中出版。下文仅注明日期。

[9] 朱自清:《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第8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10] 胡适:《留学日记自序》,《胡适全集》第27卷,第104页。

[11] 张彭春造访陈西滢家时,看到英文、法文、德文藏书颇丰,古典文学类也有《李太白集》《东坡集》等许多种。他还特别留意到,“一部《文选》翻阅得很旧”。陈自1912年赴英国读中学,后在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与张氏经历相似。张彭春在1923年12月25日日记里感慨:“旧的文学完全不通,哪能希望写好白话?”

[12] 梁启超:《三十自述》,《梁启超全集》第4集,汤志钧、汤仁泽编,第107—10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13]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18卷,第27—28页。

[14] [27] 胡适:《非留学篇》,《留美学生季报》1914年第3期。

[15] 《清华周刊》记者来书,《胡适文集》第3册,欧阳哲生编,第97—9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6] 但在读法上张氏更推崇精读,主张“把几部认为根本的书每字每句攻过了”,然后再涉阅群书。(1923年3月10日日记)

[17] 梁启超:《评胡适之〈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清华周刊》1923年第281期。

[18] 梁启超:《治国学杂话》,《清华周刊》1923年第281期。

[19] 梁启超:《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清华周刊》1923年第281期。

[20]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32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21] 张之洞:《书目答问》,第1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2] 第三部分“怎么读”,张彭春在日记中只写下标题而并未写完。而此处引述的“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两部分内容,已经可以说明张彭春此时对如何读中国书的思考。

[23]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第18册,第325页。胡适晚年说过:“不要轻易相信这种瞎说,说某人做白话文做的好,因为他读古书读的多,这都是骗你们的。”(《提倡白话文的起因》,《胡适文集》第12册,第52页)而早在1923年,胡适曾在更私密的书信中总结自己过去五年所做出的成绩,真诚地表示接受古典教育帮助很大:“在我推行白话文运动的时候,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从小所受古典的教育。”从胡适对张彭春读书的指点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古诗文、古书阅读对于读书写作的意义。

[24] 蒋梦麟:《西潮与新潮》,第156页,中华书局2017年版。

[25] 周作人:《新文学的意义》,《燕大周刊》第7期,1923年4月7日。收入宫立《中国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第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26] 胡适:《提倡白话文的起因》,《胡适文集》第12册,第52页。

[28] 1919年杜威访华期间就作出预言:“(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学生)会不自觉地将中国与美国进行比较,从而发现中国的缺陷和严重的问题。但同时,可能在内心深处,每个中国人还是坚信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可能,他们是对的——三千年的文明是一件很令人骄傲的事。”见杜威:《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的中国与日本》,伊凡琳·杜威编,刘幸译,第23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9] 胡适:《To Clifford Williams》,《胡适全集》第40卷,第297页。翻译转引自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2部上),第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高华鑫